

民族主义、近代化竞赛与日韩历史认识问题

王广涛 俞佳儒

内容提要 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日韩关系发展的症结之一,民族主义是影响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因素。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有着特殊的性格,即存在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两个侧面:本质民族主义通过近代化民族主义参加东亚国家间的近代化竞赛,这场竞赛的目标是完成“西方”规定下的近代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韩两国的近代化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采取了务实处理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国的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完成合流,其历史认识问题走向相互攻讦、问题混一的新模式。本质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与近代化民族主义的合流是日韩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两重难关。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 韩国 日韩关系 历史认识问题 民族主义 近代化

“现在看来,过去扮演配角的历史认识问题已经成为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主角,过去比未来更不可预测。”^①这是时任《朝日新闻》主笔的船桥洋一

* 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邮编:200433);俞佳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200433)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Yoichi Funabashi, “East Asia’s History Creating Mistrust,” January 4, 2015, <http://www.asahi.com/column/funabashi/eng/TKY200501040130.html>, 2023-05-17.

(Yoichi Funabashi)针对冷战后愈演愈烈的历史认识问题于 2005 年发出的感慨。如今,船桥洋一对这一“不可预测”的预测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历史认识问题及其衍生物越发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东亚地区国际关系。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殖民和侵略给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等国带来巨大苦难。而在东亚地区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韩两国间的矛盾尤其激烈。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国在强征劳工、“慰安妇”、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尽管“宫泽道歉”(1992)、“河野谈话”(1993)、“村山谈话”(1995)、“小渊—金大中日韩联合宣言”(1998),以及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2015)等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协定在规范和引导日韩关系,但两国间的历史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尹锡悦在 2022 年当选总统后,试图淡化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但这一动向受到了韩国国内的强烈抗议与反对,未来隐患仍存,远未达到尘埃落定的地步。

历史问题既与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历史有关,同时也与后殖民时代日韩两国对殖民时期的历史认识有关。其中,民族主义往往被视为日韩历史问题产生以及蔓延的重要解释变量。民族主义本身正如其英语“nationalism”所具有的多元解释那样,并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来使用,而需要对其进行解构。本文从民族主义的内在结构着手,以日韩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对立与摩擦为例,重点讨论近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对历史认识产生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作为归结点的“民族主义”

历史认识问题并非始终是日韩两国关系中的核心问题。靖国神社参拜、从军“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大多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才进入两国关系议程和大众视野,对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则是在冷战结束以后。^①时至今日,上述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那么,日韩历史认识问题为何难以解决,为何始终无法跨越浅和解而走向更深层次的和解?^②为何 20 世纪 90 年代会成为问题激化的起点?已有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民族主义往往不约而同地被当作归结点来处理。

① 木村幹「日韓歴史問題とは何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 年、29—30 頁、41—55 頁。

② 关于“浅/深和解”的讨论参见 Gi-Wook Shin, Soon-Won Park and Daqing Yang, “Introduction,” in Gi-Wook Shin, Soon-Won Park and Daqing Yang, eds., *Rethinking Historical In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Korean exper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 唐世平:《和解与无政府状态的再造:基于六部作品的批判性综述》,《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 61—104 页;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20.

(一) 日韩历史认识问题中的民族主义

历史认识需要回应民族主义的诉求,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官方历史认识往往会反映其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① 其中,部分研究关注到国际结构对民族主义和历史认识问题的影响。在冷战背景下,日本和韩国有着共同的“反共”目标,因此即便两国之间偶有龃龉,冷战大环境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都要求它们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历史认识等问题受制于军事安全框架而被搁置。^② 冷战的终结削弱了“反共”的共同目标,降低了美国维持同盟向心力的意愿,使得民族主义要素上升为两国摩擦的要因。^③

国内政治同样会影响民族主义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在韩国民主化之前,由于日韩间的巨大差距以及韩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依赖,韩国威权政府会压制民众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总体保持克制。^④ 这种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制使得日韩建交时达成的和解十分“浅薄”,为后来(特别是韩国民主化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⑤ 与此同时,政治右倾化则助长了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大规模回潮。可见,民族主义并不只是主动卷入历史认识问题,还有政府层面基于政治意图的操作。^⑥

除官方的政治操弄之外,还有研究基于具体议题来讨论民族主义影响的产生。例如,有研究指出,两国谈判的过程不透明,领导人为了表面和解而牺牲民众利益,由此引发民族主义的反抗。^⑦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副教授珍妮弗·

① 石田正治「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歴史認識」、菅英輝編『東アジアの歴史摩擦と和解の可能性』凱風社、2011年、124頁。

② 張達重「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化の流れの中の日韓関係——相互輕視の流れに対する考察」、小此木政夫・張達重編『戦後日韓関係の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5年、13頁。

③ 木村幹「1965年体制について考える:その成立から動揺へ」、『現代韓国朝鮮研究』2019年11月第19号、7—10頁;鄭敬娥「歴史認識をめぐる日韓関係の構造とその変容」、菅英輝編『東アジアの歴史摩擦と和解の可能性』凱風社、2011年、199頁;李元徳「日韓関係一九六五年体制の軌跡——過去と現在の照明」、木宮正史・李元徳編『日韓関係史:1965—2015(Ⅰ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26頁。

④ 李元徳「日韓関係一九六五年体制の軌跡——過去と現在の照明」、27—28頁; Gilbert Rozman, “East Asian Historical Issues in a Contemporary Light,” in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o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Westport and Londo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 44, 46.

⑤ Gi-Wook Shin, “Divided Memories and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in Mikyoung Kim,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mory and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411.

⑥ 李帅宇:《政体转型与冷战后日韩关系发展的困境》,《外交评论》2020年第4期,第124—154页;小此木政夫:《日本与韩国:能否实现真正的和解》,载文正仁、徐承元编:《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李春福、李成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

⑦ Tom Phuong Le,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Overcoming Legitimacy Problems in the Japan-South Korea Reconciliation Proces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8, No.3, 2019, pp. 621-644.

林德(Jennifer Lind)则认为,谢罪可能引来加害国国内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的反弹,而受害国可能会把这种反弹看作恶意,从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①

在此类叙事中,民族主义被假定为冲突性的要素,当民族主义上升为关键要素后,历史认识问题的摩擦就会加剧。而且,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冲突性要素被纳入日韩历史认识问题的分析时,就不能只关注一国单方面的民族主义。正如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齐藤弘久(Hiro Saito)所说,尽管日本的民族主义记忆是历史认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有通过韩国的民族主义记忆碰撞,才使得历史认识问题难以解决。^②因此,日本的民族主义者美化战争和殖民的同时,韩国的反日民族主义也受到同样关注。例如,韩国世宗大学教授朴裕河就批评韩国人对日本的批判和不信任是本质主义的——即便日本做出了谢罪和补偿,韩国依然不会选择宽容与和解。^③总之,在日韩历史认识问题中,民族主义的冲突性是双向的。

(二) 作为“归结点”的民族主义

不难发现,多数研究将民族主义作为归结点,而体系变迁、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并非最后的归结。在这些研究看来,冷战结束和韩国经济发展不过是为民族主义抬头提供了环境。将矛头指向民族主义的主张其逻辑是,民族主义确实与历史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包含了对本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与忠诚,因此,也会对其敌人产生憎恶。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民族国家是第一性的,忠诚与憎恶成为历史认识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叙事中历史事实只能沦为第二性的工具。

这种叙述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根据上述民族主义的逻辑,和解在强大的民族主义面前不是一劳永逸的。自冷战结束以来,韩国的民族主义常常有否定日韩两国间达成的妥协的倾向,这种倾向几乎否定了历史和解的可能性;其次,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批判对方的情绪被称为民族主义,压制本国人民不允许批判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朴正熙同样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再次,冷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大多数国家间则是向着和解迈出更坚实的步伐,而日韩之间却因历史认识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和翻案。

①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Hiro Saito, "East Asia and Cosmopolitan Memory," in Mikyoung Kim,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mory and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390.

③ 朴裕河「反日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韓国人の反日感情を読み解く」、安宇植訳、河出書房新社、2005年、147頁;朴裕河「和解のために——教科書・慰安婦・靖国・独島」、佐藤久訳、平凡社、2006年、218頁。

而且,受到国内国际形势的影响,民族主义本身也在变化之中。在既有研究中,这种变化往往被归纳为日韩两国的民族主义从被压抑到兴起的过程。然而,民族主义的变化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如前所述,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批判对方的情绪被称为民族主义,而压制本国民众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向日本发难的朴正熙同样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可见,所谓民族主义的变化不只是程度上的起伏,也有内容上的转变。

因此,相比于把民族主义作普遍化理解,更要将其作为一种日韩语境下的内生性因素来理解。^①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需要真正进入日韩历史认识问题摩擦的研究,对东亚国家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格及其内容的历时变化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内嵌于日韩历史认识问题中的民族主义。

二、分析框架: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的交织

东亚各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历史演进中进行的,因此,其民族主义的生成也根植在东亚的历史语境中。在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和形态进入东亚地区时,其历史语境使得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拥有一定的共性与特性。本节将在探讨共性和特性的基础上,提出“本质民族主义—近代化民族主义”这一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到对日韩民族主义的讨论中。

(一) 东亚民族主义的特性

民族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围绕民族定义的争论具有现实政治相关性,其目的是“出于定义者要维护他本人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利益”。^②争论者希望将自己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定义为“民族”,以此获得某种统治的合法性。而这种统治以“国家”的面目出现,由此显示出“民族”一词与“国家”的复杂关联。^③民族主义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以高度政治性的民族为中心。^④无论民族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政治运动,它都是以确立被称为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主体地位为目标。从宏观视角来看,民族主义从内外两方面确认民族的主体地位:对内确立民族统治的合法性;对外作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参与国际关系。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是成员对民族的忠诚,也是对

① 历史和解受内生性因素影响更大,参见王广涛:《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为分析框架》,《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95—118页。

② 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5—7页。

③ 同上,第2—4页。

④ 同上,第7页。

其内部互动规范的认可和对其优越性的无条件认可。^①这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对于民族主体性的确认,而在这种主体确认的基础上,民族主义还希望这一主体能够强大与繁荣。

一般来说,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被迫反应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它将文化作为聚合民族的内核,以此确立本民族国家的主体存在。^②这种冲击大概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即所谓东亚被编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时期,而最后成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本文的问题意识而言,经过这一时期而被确立的主体是当前政治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宪法体制下的日本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朝鲜半岛国家。^③

这类主体的存在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展开,并通过国家的自传式叙述体现出来。在时间上,民族主义需要提供对于过去历史的叙述,并提供对未来的愿景;在空间上,民族主义需要确定过去经验发生的场所以及未来愿景涉及的预想空间。^④从过去的时间来看,东亚国家民族主义叙述的关键节点是类似的。这些国家几乎同时进入以西方为参照的近代时期,并几乎同时形成了目前政治形态的民族国家;而从未来愿景来看,建设近代化国家是东亚各民族国家的共同目标。在空间维度上,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有相似之处:各国过去发生的核心场所是相对确定的,都有与目前范围大致等同的古代国家历史。

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叙述有着以上共同的结构,而且这样的结构是相对独特的。相比于发源较早的现代民族国家,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明显是“后生”,具有反应性的特征;相比于绝大多数由殖民地发展而成的国家,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在过去时间的叙述中又有更坚实的历史和文化基础。鉴于以上共性与特性,本文将上述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称为“东亚民族主义”,即东亚类型的民族主义,由此可以将日韩两国放在宏观的东亚民族主义维度下进行比较。

(二) 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

既有文献将民族主义看作影响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合理的,民族

① 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第18页;Kathleen E. Powers, *Nationalism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② 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李晔也认为东亚民族主义是“应激—反应型”的,参见李晔:《中日韩新四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进入了分裂状态,南北双方都宣称代表了整个朝鲜半岛,因此这里使用“朝鲜半岛国家”,而非朝鲜、韩国来指称这一民族国家。但是,鉴于日朝至今仍未有邦交,后文的分析将以日本和韩国为主要对象。

④ Felix Berenskoetter, “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No.1, 2014, pp. 262-288.

主义所提供的自传式叙述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历史认识,这是民族主义影响历史认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民族主义还从两方面确定了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基本框架。首先,目前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议主要存在于民族主体之间。民族主义的叙事通过经典的“国家是人的隐喻”(state-as-man metaphor)将民族国家拟人化,构建出民族主体的“身体”和“精神”。^① 历史认识问题矛盾的经典表述如“伤害民族感情和尊严”等就显示了这一点。于是,作为主体的民族就被假设拥有对尊严、地位等情感的诉求。^② 在民族的宏大视野下,个人间关系并不是第一位的。其次,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过去的时间维度之上,它涉及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在东亚的语境中,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焦点正是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因而,历史认识的差异对于东亚国家主体的存在尤为重要。一般认为,在面对这些差异时,民族国家通过对历史记忆的操作煽动本国的民族主义。但是,正如淡化历史认识问题的朴正熙同样被称为民族主义者所显示的那样,所谓民族主义并非总是与历史认识问题的矛盾相伴生。

特别是在东亚民族主义的语境中,“民族主义”的概念并非不可分的整体。本文认为,基于东亚经验和愿景的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两个侧面。一方面,可以将精神诉求寄托于主体本身。这种侧面倾向于从内部发掘尊严,将某些特质与民族作本质性的联系。它的主要资源来自关于过去时间叙述中的民族共同经历,例如,自古以来的血缘关系、土地意识和连续传统等。但它不止于对传统的复述,而是从这些传统中抽象出一个民族的精神作为尊严的来源,本文将这种倾向称为“本质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情感诉求寄托于关于未来愿景的述说和行动之中。就东亚而言,这更具体地表现为近代化的目标与进程,因而可以称其为“近代化民族主义”。它为现代民族国家指明了发展方向——近代化。^③ 也就是说,它主要回答“已经成为主体的我们要做什么”这一问题。对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木宫正史曾指出,近代化民族主义是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原型之一,它着眼于如何建设近代国家这一课题。^④ 而在日本,何为近代化、如何近代化、是否已经近代化等问题也始终与日本民族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

自东亚民族主义诞生之初,就已经呈露出其内部结构的分异。作为对西方

① Paul Chilton and George Lakoff, “Foreign Policy by Metaphor,” in Christina Schäffner and Anita L. Wenden, eds., *Language and Peace*, Aldershot: Farn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p. 37-60.

②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7页。

③ 近代化(Modernization)在中文语境下往往被翻译为“现代化”,本文不对这两个概念做专门区分。

④ 木宫正史『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見た韓国・北朝鮮近現代史』講談社、2018年、17—18頁。

冲击的被迫反应,东亚民族主义一方面需要回顾各自的历史,以确保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们又在与西方的交往中确立了近代化的目标。同时,这两个侧面相互区分但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本质民族主义同样会对近代化的成果产生积极影响。例如,近代化的顺利进行可能会引起民族自豪感,但本质民族主义倾向于将这种成功归结于主体的本身特质而非行动过程。同样,近代化民族主义同样与过去经验有关,但是过去经验仅仅是近代化目标生成的历史背景,它本身并不提供尊严的来源。最终,这两种侧面都被统一在“民族主义”的总体纲领之下,即确立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对其未来的期望。

(三) 近代化竞赛与历史认识问题

作为一种民族主义,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对尊严来源的不同看法,东亚民族主义最终还是会激发提高本国地位的努力。^① 在东亚的语境中,这种努力不仅包括建立现代国家、得到国际社会平等承认的一面;而且由于历史、人种、文化上的相似性,它常常包含着与邻国间相互比较甚至“竞赛”的一面。在近代西方的认识论中,东方(日本称“东洋”)代表着落后和愚昧,尤其是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所谓东洋的鄙视,对东方各国自身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② 在区分了东亚各国间“我和他”的关系后,如果能率先走出这样的落后状态,那么就能够成为这一区域的代表,能够开创出新的历史。总之,近代化民族主义追求本民族绝对的近代化,但它在本质民族主义的加持下则希望本民族在东亚成为近代化的领头羊。并且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东亚民族主义的深远影响,领先国会一定程度上鄙视近代化的落后者。^③ 另一方面,落后者亦会构建某种叙事来构建自身在某一方面的优越地位(特别是文化优越)。在这种视角下,日本历史上的“脱亚论”就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化竞赛中一种“自我宣布的胜利”。

东亚民族主义参加了一场近代化的竞赛。这场竞赛的参赛选手是被民族

① 已经有研究指出了地位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参见王梓元:《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6—139页。

② 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藤原書店、2003年、51—80頁。

③ 关于进化论与东亚民族主义的关系,参见 Vladimir Tikhonov, *Social Darw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Korea: The Beginnings (1880s-1910s): "Survival" as an Ideology of Korean Modernit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0;〔韩〕禹男淑:《社会进化论与韩国近代民族主义:以朴殷植为中心》,《韩国东洋政治思想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9—167页[禹男淑(2008), 사회진화론과 한국 근대 민족주의: 박은식을 중심으로, 한국동양정치사상연구, 제7권제2호, 139-167];〔韩〕曹成煥:《进化论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和章炳麟的民族思想为中心》,《政治思想研究》2010年第1期,第194—216页[조성환(2010), 진화론과 근대 중국의 민족주의: 양계초와 장병린의 민족사상을 중심으로, 정치사상연구, 제16집1호, 194-216];王柯:《亦敌亦师亦友: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4页;归永涛:《民族主义与中日韩三国近代的历史观》,《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第167—178页;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主义确认的民族国家主体,而竞赛的内容则是近代化的速度与质量。但近代化竞赛的标准却并非来自东亚内部,而是来自作为“他者”的西方,如建立现代国家、富国强兵、发展科技等,东亚便成了以西方文明化为基准并争相追求西方认可的竞技场。

然而,“西方”并非一个固定的理念,它也会发生变化。当西方将大力倡导“民主”,认为民主是现代的要素之一时,东亚国家的一些群体便会自发地追寻它。可见,虽然东亚话语中的“西方”及其所代表的“近代”这一表述本身是形而上的,但其具体内涵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因此,近代化竞赛的目标也会随之改变。例如,虽然20世纪80年代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强调政治民主的民族主义两股浪潮曾在韩国产生过对立,^①但二者都能够统一到近代化民族主义的框架中,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它们在近代化中的地位有所不同。

同时,东亚民族主义也不追求“全盘西化”,由于本质民族主义对本国历史、文化的强调,近代化民族主义发挥的范围也是有限的。申采浩等近代朝鲜民族主义者倾向强调朝鲜的优秀文化,韩国独立后的李承晚、朴正熙以及其后的历代总统也都推动了本民族文化的振兴。纵观日本思想史,近代的国粹主义者亦侧重强调日本独特的文化价值。战时日本的国体论者以及战后不断涌现的“日本人论”,都体现了日本近代化思想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

总体来看,民族主义确认了民族国家主体的存在,而这些主体参与了一场近代化竞赛,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就在近代化竞赛的过程中产生。从本质民族主义和近代化民族主义的框架来看,本质民族主义所依赖的尊严来源是相对模糊的,而近代化竞赛的成果,即近代化民族主义的尊严来源是相对清晰的,可以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指标来衡量。相比于近代化民族主义,本质民族主义对于历史争议更为敏感。从经典的“加害者—受害者”框架来看,加害行为使得一个本该平等的民族主体产生耻辱,这种耻辱是过去的经验,更接近于本质民族主义的关心范围。而且本质民族主义不容许这些耻辱再次发生,它往往会通过“勿忘国耻”等意识形态教育来为自身正当化。^②

对此,本文认为,在近代化民族主义倾向占据优势地位或民族主义整体并不强势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对于叙事中的未来愿景着墨更多,这时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对于受害者来说,此时的历史认识争议并不是民族本体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扩大争议可能对近代化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它

① 〔韩〕朴海男:《1990年代的国际化·世界化与民族主义》,《韩国民族文化》2020年总第77期,第469—513页[박해남(2020), 1990년대의 국제화·세계화와 민족주의, 한국민족문화, 제77호, 469-513]。

② 相关研究参见 Zheng Wa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很可能选择在叙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搁置。而加害者同样对于这些争议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当加害者在近代化竞赛中领先时,这些争议并不会对其民族叙事产生太多威胁性影响。

而在本质民族主义强势的情况下,由于其把民族本体而非行动看作尊严的来源,会更加注重过去的受害经历,因此,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更为强硬。受害者会重新发掘过去的创伤并试图补救,而加害者在受到控诉时也会为了本民族主体的尊严而选择回击。特别是当近代化竞赛中遭遇挫折时,民族主义会倾向于从本质民族主义中寻求补充,从而更加维护民族叙事的神话,最后形成保守的历史认识。

基于前述分析框架和基本假设,本文以冷战的终结为分界点,探讨前后两个时期日本和韩国本质民族主义和近代化民族主义的变化。同时,参照两国在近代化竞赛中关系的转变,分析日韩历史认识问题从相对稳定到逐渐激化的原因,为理解日韩关系的波动起伏状态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三、近代化民族主义主导下对摩擦的务实处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不过,处于同一阵营下的日本与韩国并未直接建交,而是直到1965年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建交后,历史认识问题并未成为争论的焦点,或者说处于“沉默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认识才开始“问题化”,但远不如当今那么强烈和复杂。本节着重分析冷战期间两国民族主义特征与历史认识问题“沉默期”之间的关系。

(一) 近代化民族主义的优势地位

1. 韩国的近代化民族主义叙事。大韩民国成立以后,李承晚在美国的扶植下当选为总统。在朝鲜王朝末期,李承晚就开始参与开化思想影响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并在大韩帝国时期因此被捕入狱。而在大韩民国建立后,李承晚政权展现了其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

李承晚政权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来自其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的身份,因而李承晚提出了“一民主义”作为其国家建构的中心思想,将民族统一与反共置于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位置。^① 因此,韩国建立初期的近代化民族主义的

^① Gi-Wook Shin,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0-103. 这一路线可以被概括为“先统一,后建设,必要时不惜武力”,参见王生:《当代韩国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0页。

侧重点在于建立民族统一的独立国家,即以武力“北进统一”,而非经济发展等其他侧面。^①此外,刚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韩国本质民族主义也带有反日的特征,这一时期韩国报纸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亲日派”的处置问题和对日赔偿请求问题。^②而李承晚政权也推动了一系列反日政策,最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保护渔业资源为由设置的“李承晚线”(又称“和平线”)的事件上。

朴正熙政权同样重视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并推行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版本,即“祖国近代化”。不同于李承晚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出身,朴正熙特别将经济发展纳入民族主义的范畴,以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③朴正熙将本民族的近代化总结为三个解放:从分裂中解放的祖国完全统一,从他国侵犯中解放的主权确保和从贫困中解放的富饶生活。^④而且,朴正熙将经济发展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其近代化民族主义带有浓厚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⑤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尤其是与北方共产主义的竞争在于“经济的竞争”,因而需要发展“国家自主经济”以巩固国家的安全。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近代化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朴正熙否定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等本质民族主义的方面。朴正熙强调只有有着清晰自我身份的民族才能取得近代化的成功,民族的近代化离不开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⑥例如,朴正熙下令从1970年起在教科书中停止使用汉字,以此强化本民族文字的地位。总之,朴正熙的近代化民族主义强调的不仅是“近代化”,同时还强调作为主语的“祖国”,以此与本质民族主义产生了联系。

但是,“祖国近代化”的历史观决定了近代化民族主义相较本质民族主义的优势地位。对于朴正熙来说,对于某些传统的调用仅限于巩固政权的需要。^⑦对那些有碍于近代化的传统则持否定态度。例如,朴正熙批评朝鲜王朝缺乏主体性和改革性,而这种缺乏是儒教的停滞性导致的。^⑧

因此,“祖国近代化”要求对民族进行改造,就需要在改造中抛弃某些传统,朴正熙推动的“新农村运动”(새마을 운동)就被指责破坏了传统的农村共

① 木村幹『近代韓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ナカニシヤ出版、2009年、203頁。

② 木村幹『日韓歴史問題とは何か』、28頁。

③ Gi-Wook Shin,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 103.

④ 奥園秀樹「朴正熙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対米依存」、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2001年第126号、66頁。

⑤ 同上、74—75頁。相对于李承晚,朴正熙的路线可以被概括为“先建设,后统一”,经济建设在朴正熙的计划中是第一位的,参见王生:《当代韩国民族主义研究》,第29—33页。

⑥ Gi-Wook Shin,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p. 106.

⑦ 〔韩〕朴海男:《1990年代的国际化・世界化与民族主义》,第478页。

⑧ 小倉紀蔵『朝鮮思想全史』筑摩書房、2017年、387頁。

同体。总之,在这种近代主义的思想下,本质民族主义是被压制的。

2. 日本民族主义的退潮与暗流。日本的民族主义状况更为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整体的思想氛围被笼罩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下。战败以后,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① 受此影响,日本保守政治家们确立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走上了亲美保守的现实主义和“低姿态”的实用路线。与战时“天皇·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认同截然不同,战后日本的“民族”和“国家”呈现分离状态,其国家认同的归宿在以宪法第九条为中心的和平国家上。^② 与此同时,以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为代表,日本保守派内部也存在一股与战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有一定关联的思想“逆流”。^③ 与“吉田路线”不同,他们企图推动再军备和大国化的日本,以此来重建国家。

在和平民主主义的社会思潮和现实主义的保守政治的大环境下,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潜伏了,但是,近代化的话语在日本依旧有所体现。和平主义追求的是反美独立与和平的“革新民族主义”,而保守政治家们追求的是国内经济发展的保守现实民族主义。^④ 两种民族主义分别对应着近代化目标中建立独立国家和经济发展的两个侧面。近代化意识也反映在日本政治家和官僚对殖民统治的态度上。例如,1953年,李承晚历史性地到访东京,却并未获得对等的待遇,反映了吉田茂对殖民统治从来没有过负罪感。^⑤

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著名的“久保田妄言”事件。1953年10月15日,在日韩第三次会谈中,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称在殖民统治期间,“日本为朝鲜修建了铁路、港口,开垦了农地,甚至有的年份大藏省(向朝鲜)拨款2000多万日元”。^⑥ 这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强烈抗议,要求日方撤回发言。然而,日本方面不仅没有撤回这一发言,时任外相冈崎胜男还称这一发言“只不过讲了通常情况下都要讲的话”。^⑦ 这是典型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叙述,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对朝鲜半岛的近代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虽然在日本看来,其确实在殖民统治时期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朝鲜半岛,以及当时殖民统治是世界常见的现象,但是“殖民地近代化论”将“近代化”作为一种价值和目标置于过高的位

① 参见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93页。

② 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3、179页。

③ 同上书,第173—174页。

④ 参见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第192—193页。关于“革新民族主义”可以参见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増補版]』、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年、247頁。

⑤ 〔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185页。

⑥ 安成日:《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⑦ 同上书,第181页。

置,而不顾对方本质民族主义的情感。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依旧保持了强烈的近代化意识。他们忽略了殖民地近代化过程中的暴力性因素,以及给朝鲜民族带来的屈辱感。

1960年安保斗争以后,日本保守政治重新回归重经济的路线。随着经济的增长,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日本人的认同感的“政府/企业二元结构”更加明显,甚至日本人的企业认同比国家认同更为强烈。^①与此同时,承接着岸信介的国家主义逆流,右翼势力也开始行动,意图恢复国家主义。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日本历史的重新重视,例如,推动国旗、国歌、纪元节和元号法等问题上的推动。不过革新势力尚未完全消退,对右翼的这些行动进行了强烈的反抗。^②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30年,革新势力的存在对本质民族主义的复燃形成阻碍,本质民族主义更多作为一种潜流而存在。强调过去历史、有美化历史倾向的本质民族主义并不突出,甚至缺少足够的社会基础,很难真正返回日本政治之中。最终在自民党的保守实用路线下,近代化民族主义是占据优势地位的。

(二) 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务实处理

朴正熙上台后,推出“祖国近代化”计划,推动“国家自主经济”的建设,但是,经济建设却遇到了资金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发生变化,对韩国的直接援助大幅减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资金短缺是朴正熙的近代化民族主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朴正熙将目光转向了日本。^③这时执掌政权的池田勇人内阁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推进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在开拓海外市场、安全保障(稳定韩国以防范朝鲜)、亲韩派的活动以及美国的建议等多方面考虑下,日本考虑以经济方式对韩国展开援助和合作。在此背景下,韩国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泌和日本大藏大臣大平正芳于1962年10月达成《大平—金备忘录》,日本承诺将向韩国提供贷款和援助,但没有处理韩国对日请求权等关键性问题,可见两国在面向未来的志向上保持了一致。^④而这一协定成为日韩两国建立正式关系的一大阶段性

① 武心波:《“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4页。

②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200页。

③ 朴正熙曾对金钟泌说,与日本建交是近代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参见2005年6月3日NHK对金钟泌的采访,<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N1H9qFf7aU>,2023-05-17。

④ 福岛啓之「戦後日本の関係修復外交と近隣諸国の対日認識」、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2012年第170号、117頁。

进展。

两国最终在1965年达成《日韩基本条约》及一系列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具体而言,条约没有涉及任何道歉或谢罪的内容,这些内容由外相椎名悦三郎口头表达,而且条文对一些关键问题保持模糊。例如,对于日韩合并的合法性问题,条约第一条规定“1910年8月22日以前日本帝国和大韩帝国缔结的一切条约与协定确认已经无效”。这一条款的模糊性在于无效的原因与失效时间。韩国认为日韩合并条约本身是非法而无效的,而日本则将其解释为合并本身是合法的,只是根据《旧金山和约》而失效。

和历史认识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协定是《请求权协定》。该协定的全称为《日本国和大韩民国关于解决财产及请求权相关问题和经济合作的协议》,这意味着当时两国是把与历史问题相关的请求权问题和经济合作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一揽子解决的。从韩国方面来看,朴正熙最终决定不区分个人受害者,而是由韩国政府统一接受,以此为资金来源来发展经济。^① 协定第二条还表示,两国和国民间的请求权问题已经达成了“完全且最终的解决”。^② 这一点特别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也为日后两国关于民间请求权问题的摩擦埋下了隐患。总之,以1965年的一系列协定为基础的所谓“1965年体制”是以安全和经济这样的物质要素为优先考量的,^③充分体现双方特别是韩国的近代化民族主义。

这种基于近代化立场的《日韩基本条约》的签订在两国民间都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在韩国,学生以及在野党认为政府在没有获得道歉和彻底赔偿的情况下便与日本签订条约是不可接受的,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朴正熙为了“祖国近代化”的需要,镇压了抗议活动。日本左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抗议运动的出发点则是和平民主主义,认为仅以韩国为合法政府而试图解决朝鲜半岛的历史认识问题不利于和平,甚至此时的韩国政府是军事独裁政权,不符合民主主义的价值观。^④ 但这些抗议活动与反安保斗争等和平主义活动相比规模不大,最终也没能阻止国会批准条约。

最终,《日韩基本条约》生效,开启了两国正式邦交的历史。两国对建交问

① 木宮正史『日韓關係史』岩波書店、2021年、57頁。

② 「財産及び請求権に関する問題の解決並びに経済協力に関する日本国と大韓民国との間の協定」、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A-S40-293_1.pdf、2023-05-17。

③ 木宮正史『日韓關係史』、63—65頁。

④ 参见〔日〕若宮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第191—192页。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方面批评的出发点在于《日韩基本条约》没有与殖民时期做出了断，而日本方面的抗议则没有这样的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日本和平主义的“空心化”。

题的处理是务实的。其原因在于朴正熙的近代化民族主义在韩国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借助权力对民间的本质民族主义情感进行了压制。而日本此时的民族主义具有实用性特征,在重经济和亲美的保守政治体制下,选择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与韩国展开正式关系。在两国的意愿中,殖民地清算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虽然会谈中 these 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但在最终的结果中却被模糊化处理。两国并没有就历史认识问题展开更多的努力,而是选择了疏远。^①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两国之间也没有发生激烈的历史认识问题摩擦。即便是田中角荣有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发言,韩国方面亦没有深究此事。^② 尽管韩国国内的本质民族主义对日本的一些行动和言论做出过强烈的反应,但这些反应最终都只是暂时性的,没有对日韩关系大局造成过多的影响。这是由于此时的近代化民族主义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并不面对过去的耻辱。日本主流社会思潮都相对忽视殖民统治问题。对日本而言,韩国不是受害者,而只是对近代化有益的待开拓市场。最终两国都选择务实地处理历史认识问题。

(三) 历史认识问题初显:20 世纪 80 年代的过渡期

韩国经过朴正熙时期的改革,经济实现快速发展,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1961 年的 24.18 亿美元增长到 1979 年的 669.47 亿美元,排名世界第 23 位。^③ 全斗焕上台后,基本延续了朴正熙的战略,继续以经济为中心推动近代化。与朴正熙执政初期类似,全斗焕政权同样面临严峻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是在血腥镇压“光州事件”后,全斗焕政权的合法性遭遇了更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继续维持近代化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全斗焕也开始转向本质民族主义情感,以弥补自身的合法性缺失。

此前朴正熙的政策已经被批评为“亲日”,因此,为了弥合本质民族主义情感和近代化发展之间的分歧,全斗焕提出“克日”的主张。“克日”意味着通过学习日本的发展道路来超越日本。^④ 正如上文所说,在东亚的近代化竞赛中,国家可以通过近代化的成就调动部分本质民族主义的情感,而获得西方的认

① [日]波多野澄雄:《国家与历史: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马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2 页。

② 南相九「歴史問題と日韓関係」、木宮正史・李元徳編『日韓関係史:1965—2015(Ⅰ 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 年、327—328 頁。这一事件的解决如此迅速,以至于很难被称为“问题”。后来发生的众多阁僚妄言事件至今仍然会被公众广泛讨论,尤其是被韩国网络世界援引作为抨击日本的历史认识的素材。但是以田中角荣为主角的这次妄言事件却很难在当今的网络世界中找到痕迹。

③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1979&locations=KR&start=1961,2023-05-17>。

④ 小倉紀蔵「朝鮮思想全史」、388 頁;木宮正史「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見た韓国・北朝鮮近現代史」、124 頁。

可就是一种途径。于是,全斗焕上台初期便推动汉城^①成功申办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汉城成为东京之后第二个成功申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韩国还力压日本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举办大型运动会尤其是奥运会,体现了韩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迎来了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政治上表现为新保守主义和大国化倾向。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已经显现出这样的趋势。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逐步确立了“经济大国”和“和平国家”的国家认同,引起了日本国民的自豪感。1973年、1978年、1983年和1988年的四次舆论调查显示,认为“生在日本真幸福”的受访者比例始终高于90%,而“看到日本古寺院和民居会感到亲切”的比例也始终高于80%。^②与此同时,“爱国心”以及日本文化论等话题在该时期被广泛讨论,反映出日本人恢复的文化自信,只是这些变化还没有反映到政治上。^③而以中曾根康弘上台为标志,以大国化和新保守主义为表现的民族主义全面回归日本政治。在政治上寻求大国化、谋求改变原有保守主义的经济中心路线,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的主流思想。

这两种思想事实上承接了近代化民族主义的路线。“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评价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需要完成真正的近代化、取得认可,就需要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因此,在经济上完成近代化目标后,需要在政治上完成真正的近代化。

综合两国民族主义的状况来看,韩国依旧维持着近代化民族主义占优势的格局,但本质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开始上升;而日本经历了30年左右的民族主义潜伏期,民族主义话语开始回归,在近代化民族主义上表现为政治大国化,在本质民族主义上表现为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尽管韩国的近代化取得了成就,但与日本相比仍有巨大差距。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遥遥领先于韩国。因此,在近代化竞赛的过程中,日本是绝对的领先者,历史认识上趋于保守;而韩国虽然在追赶,但由于实力依旧不足,加之近代化民族主义的优势,因此韩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发难也比较克制。两国在该时期的克制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案例上。

① 虽然在1946年韩国首都就由殖民地时期的“京城府”改为“Seoul市”,但直到2005年中文世界仍通称其“汉城”,其举办的赛事则仍基本沿用“汉城亚运会”“汉城奥运会”。因此本文在此处仍用“汉城”。

② NHK世論調査部荒木央・村田ひろ子・吉澤千和子「45年で日本人はどう変わったか(2)」『放送研究と調査』2019年6月号、68頁。

③ 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第194—201页。

首先是两国对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处理。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报道,实教出版社教科书中的“侵略华北”(華北に侵略)被要求改为“进入华北”(華北に進出),此外“三一运动”也被要求改为“暴动”。次日,韩国的《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媒体仅用很小的版面简单报道了此事。直到一个月后,韩国的媒体才开始积极反应,大量报道和批判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这一动向。有学者认为,韩国在初期保持克制是为了配合全斗焕对日本40亿美元经济合作的要求。^①在韩国等国家表达强烈抗议之后,日本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在8月26日发表谈话,表示会充分听取各国的批评,会努力改订检定的标准,随后制定了“近邻诸国条款”。1984年,全斗焕访日之际,日本天皇对两国将过去不幸的历史表示遗憾,这一表态也得到了韩国方面的接受。而1986年第二次教科书事件中,《新编日本史》提交审定并引发韩国强烈抗议后,首相中曾根康弘还指示文部大臣海部俊树注意宫泽的谈话并慎重处理。此外,当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发表肯定殖民活动的言论后,中曾根最终将其罢免。从当时的语境来看,通过罢免阁僚的形式施以惩罚是自1953年以来时隔33年才出现的罕见案例。日本的保守政治家们以这样的方式给右翼民族主义“踩了刹车”。^②而韩国则在日本解释后表现出了接受的态度。

第二个重要事件是中曾根康弘作为现职首相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引来中韩等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使得原本限于日本国内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面对亚洲各国激烈的反应,中曾根康弘次年即停止参拜。中曾根康弘的近代化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国际国家。因此,面对参拜带来的对亚洲外交的伤害,中曾根选择了国际主义而不是本质民族主义。^③而韩国也没有对这一问题穷追不舍,这一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两国民族主义结构的变化,历史认识问题开始初显,如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等也成为当下理解历史认识问题的主要方面。虽然冲突相对增多,但日韩两国在各自近代化民族主义的目标下都继续选择了务实处理的路线。

① 南相九「歴史問題と日韓関係」、329—330頁。

② 木村幹「日韓歴史問題とは何か」、127—129頁。

③ 〔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第178—182页。若宫认为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中曾根选择了国际主义路线十分讽刺。但在本文的问题意识中,中曾根的选择是符合其近代化民族主义意识的。

四、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话语的合流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暗流开始浮现。与此同时,日韩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都面临巨大的转型。这种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的变化影响了两国民族主义的形态,从而促进了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话语的合流,从结果上来看则是日韩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的对立和冲突愈演愈烈。

(一) 本质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化话语的转变

韩国于1988年完成民主化转型,过去由于国内政治原因而被长期压制的本质民族主义情绪获得了表达通道。经过多年的民主实践,民主主义成为了韩国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原本以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为目标的近代化民族主义也获得了民主主义的新内涵。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浅野丰美指出,韩国的民主化过程打破了独裁政权所主张的以物质发展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使得市民们也能够自由参与到“民族”何为的讨论中。^①这意味着单纯的物质发展已经不再是近代化的唯一目标,成熟的自由民主、对于人权的尊重也成为近代化应有的一部分。这使得韩国的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完成了合流:本质民族主义通过民主左右国家近代化的方向,而失去了权威支撑的近代化民族主义则需要本质民族主义以维持自身的合法性。而且,韩国的民主化也通过动员关于殖民时期的集体记忆凝聚力量。^②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国内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清算历史”的强烈倾向。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兴起了“新民族主义”思潮。海湾战争、泡沫经济崩溃和阪神大地震等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给日本民族主义的大国目标带来致命打击。^③在日本人的不安中,“自由主义史观”大行其道,企图从日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重建日本人的自信。另一方面,大国化和正常国家化又作为近代化民族主义的目标而继续存在。^④秉持“自由主义史观”的学者和知识分

① 浅野丰美「日韓の国民形成の断層と和解学——価値と記憶の融合をめぐる内外政治の共振」、浅野丰美編「和解学の試み——記憶・感情・価値」明石書店、2022年、328頁。

② Eun A Jo, “Memory, Institu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South Korean-Japanes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6, No.4, 2022, pp. 767-798.

③ 杨伯江把这种危机中生发的民族主义称作“‘悲壮’的民族主义”,参见杨伯江:《当前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第6—11页。

④ 〔韩〕李钟国:《日本保守政治家的历史认识与历史的展开》,《东北亚历史论丛》2016年总第51期,第209—236页[이종국 (2016), 일본 보수정치인들의 역사인식과 역사적 전개, 동북아역사논총, 제51호, 209-236]。

子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众,将新民族主义与政治上的近代化民族主义链接起来。于是,日本的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也完成合流。只不过日本的近代化目标更为具体,即大国化与正常国家化。因此,虽然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依旧是保守势力执掌政权,但是他们更加需要本质民族主义来稳固地位,所以,日本政治出现了右倾民族主义的现象。^① 进入 21 世纪后,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先后长期执政,毫无疑问助长了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及民族主义倾向。在民众层面,互联网等公共参与工具的发展,使得民族主义话语,尤其是本质民族主义情感有了更广泛的民众基础。

冷战结束后,两国都完成了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的合流。在近代化竞赛中,优势地位丧失带来的失落使得日本更加需要本质民族主义来重建自信;长期受到压制的本质民族主义则给韩国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更大的攻击性。近代化民族主义追求绝对的近代化成果,而在本质民族主义的加持下会关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近代化成就的达成激发本质民族主义的感情,使得美化历史或清算历史的倾向更为强烈。在这种状况下,历史认识问题真正进入白热化状态。

(二) 日韩历史认识问题的具体表现

冷战结束以来,日韩历史认识问题集中爆发,其代表性的对立体现在日本对殖民统治的道歉与否以及“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问题的“扩大化”以及“再生产”。^② 本节将以道歉问题和“慰安妇”问题为例,分析历史认识问题争论的最新进展。

1. 道歉:“村山谈话”及其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高层曾明确表达过对过去行为的反省与歉意。例如,宫泽喜一首相访韩时不断重复的道歉,以及河野洋平 1993 年发表谈话表达的对“从军慰安妇……衷心的歉意与反省的心情”等。尤其是 1993 年“五五体制”崩溃后,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为日本的道歉谢罪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最终在战后 50 年之际形成了著名的“村山谈话”。

事实上,日本方面认为“村山谈话”已经是一次正式的反省。但是,从韩国方面的回应来看,韩国对“村山谈话”的评价不如日本国内的评价高。他们在欢迎“村山谈话”的同时,强调“希望日本政府认真努力”,这意味着韩国认为

① 李莹:《90 年代后日本的右倾民族主义》,《日本学刊》2007 年第 4 期,第 30—41 页。

② 木宫正史『日韓關係史』,183 頁。

“村山谈话”并非历史认识问题的终点。^①“村山谈话”并没有真正开启问题解决的大门,其实际作用是短暂且空虚的。谈话首先遇到了日本国内的冲击。1995年10月5日,村山富市本人在参议院本会议上发表了《日韩合并条约》合法的观点;11月7日,时任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在记者会上发表了美化殖民统治的观点。同时,虽然许多日本人积极评价“村山谈话”,但谈话的反省话语遭到了日本国内右翼和修正主义的批评,其主张被认为是“耻辱的”。^②这些发言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并使得韩国民众怀疑“村山谈话”的真实性。

“村山谈话”还遇到韩国方面的冲击。在“村山谈话”发表后的次年(即1996年),日韩历史认识问题就因独岛问题遇到风波。1996年,韩国国会讨论在独岛建设锚地,并予以实施,这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1996年回答“对韩国不感到亲近”的受访者比例高达60%,从当时来看已经是历史的最高点。^③

从后续影响来看,“村山谈话”的精神一直被日本历届政权延续。进入21世纪后,小泉纯一郎的战争结束60周年讲话和安倍晋三的70周年讲话虽然对一些问题有模糊化的倾向,但大体都延续了“村山谈话”的重点语句和框架。^④然而,韩国民众对“村山谈话”的认知并不充分。201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4.3%的韩国受访者表示听说过“村山谈话”,其中大部分人不知道“村山谈话”的具体内容,只有2.7%的受访者知道“村山谈话”的内容是对过去侵略和殖民活动的道歉。^⑤这不仅体现了“村山谈话”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更反映了“村山谈话”在韩国叙事中的冷遇。从道歉(谢罪)的视角来看,日本认为“村山谈话”是历史认识问题的终结,而韩国则认为它只是开始。

事实上,无论是“村山谈话”,还是此后的1998年日韩联合宣言和2010年日韩合并100年之际菅直人首相所发表的谈话,在发表当时都受韩国方面的积极评价。然而,正如“村山谈话”的遭遇一样,它受到来自日本保守势力的牵

① Jane W. Yamazaki, *Japanese Apologies for World War II: A Rhetor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08.

② [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第249—250页; Jane W. Yamazaki, *Japanese Apologies for World War II: A Rhetorical Study*, p. 108.

③ 日本政府内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八年)、<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08/gaikou-h8.html>, 2023-05-17.

④ 这并不是否认安倍等日本政客历史认识的保守性。参见[韩]南相九:《安倍政权的历史认识与韩日关系》,《韩日关系史研究》2013年总第46期,第227—267页[남상구(2013) 아베 정권의 역사인식과 한일관계, 한일관계사연구, 제46집, 227-267]。

⑤ Youngshik D. Bong, “In Search of the Perfect Apology: Korea’s Responses to the Murayama Statement,” in Kazuhiko Togo, ed., *Japan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war Asia: The Murayama Stat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56-58.

制,日本方面很难实现国家赔偿等韩国方面的诉求。这些所谓的日韩和解的象征,在其后大都受到冷遇。

2. “慰安妇”问题。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尹贞玉就已经开始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但“慰安妇”问题被广泛讨论则是冷战结束后的事情。特别是在韩国女性运动的大背景下,1990 年 5 月 18 日韩国女性团体联合发表《韩国女性界关于卢总统访日及挺身队问题的立场》,正式以运动的方式讨论“慰安妇”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得到了日本女性运动的关注。然而 1990 年 6 月,日本政府在国会质询中却表示,无法确认“慰安妇”问题的实情。

1991 年,金学顺老人将日本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揭露出来。由于首次有受害者实名举证,这在两国社会引发了激烈的反应。经过“加藤谈话”(1992)、“河野谈话”(1993)等,日韩各方舆论围绕“慰安妇”问题的性进行了攻防战。在村山内阁时期,日本开始着手对“慰安妇”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解决。

解决方案的核心是成立“亚洲女性基金”,发动日本民间共同出资,通过赔偿、建立医疗等福利设施等方式以补偿韩国、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的原“慰安妇”老人。起初,韩国政府对这一方案表示欢迎;但是,在国内团体的强烈抗议下,以及在 1995 年 10 月村山富市肯定《日韩合并条约》合法性后,韩国政府对亚洲女性基金的态度转为冷淡。^①

同时,韩国专注于强征劳工和“慰安妇”问题的团体“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对基金由民间出资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认为必须要求日本政府在承认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国家赔偿,而非进行国民参与的民间赔偿。^②对此,“挺对协”还发动舆论攻势将接受亚洲女性基金赔偿的原“慰安妇”称作“公娼”,并在得知 50 多名原“慰安妇”老人表达了希望接受赔偿的意思后,“挺对协”要求韩国政府公开名单,“搜捕”这些“犯人”。^③事实上,韩国政府将拒绝亚洲女性基金的补偿作为领域韩国政府提供的生活补助金的条件,接受了亚洲女性基金补偿的 11 人则被排除在外。^④

进入 21 世纪后,“慰安妇”问题虽然始终摆在日韩之间,但在独岛(日本称“竹岛”)等其他问题的争论中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2015 年,两国达成了关于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在韩国国

① 木村幹「日韓歴史問題とは何か」、205—206 頁。

② 大沼保昭「『歴史認識』とは何か」中央公論新社、2015 年、146 頁。

③ 同上、147—148 頁。

④ 服部龍二「外交ドキュメント 歴史認識」岩波書店、2015 年、136 頁。

内受到了强烈反对和猛烈抨击。首先,韩国在野党强烈反对慰安妇问题协议的达成,并在上台执政后采取了事实上否定的态度;其次,韩国民众也强烈反对这一协议。^① 不仅阻止履行协议中拆除首尔市内“慰安妇”雕像的内容,还在釜山新建了一座。

最后,2018年11月21日,韩国方面宣布解散根据两国“慰安妇”协议成立的基金会,宣告了协议的最终破产。这使得日本对韩国的诚信产生怀疑。慰安妇问题不仅没有最终解决,反而引发了更严重的对立。2021年5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之会”(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建议从教科书中完全删去“慰安妇”字样,再次引发韩国的强烈抗议。

(三) 日韩历史认识问题摩擦的新模式

这一时期,两国不仅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加深,而且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也呈现出了“相互攻讦”和“问题混一”的新的互动模式。

日韩历史认识问题已经不再是以前“日本制造言行—韩国做出反应”的模式,而是转变为“相互攻讦”的模式。这种相互攻讦特别表现为日本方面所谓的“反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3年起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开始将两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形容为“历史战”。^② 具体而言,这种反击体现在日本政府官员的妄言或右翼势力的活动伤害韩国的民族主义感情,韩国不断地要求道歉伤害日本民族主义的感情。事实上,从1995年“村山谈话”、1998年“小渊—金大中日韩联合宣言”到2015年日韩“慰安妇”协议,尽管两国就历史认识问题达成过形式上的和解,但都由于双方国内的反对又引发对方国内再反对,而导致形式成果事实上的无效。

日韩历史认识问题也不再是过去“就事论事”的模式,而是进入了“各种问题混一”的模式。正如上文所说,韩国政府对亚洲女性基金会的态度由于村山富市关于《日韩合并条约》的发言而由热转冷,“慰安妇”问题牵引出教科书问题等等,各类历史认识问题常常被一起讨论,一个领域内的冲突会蔓延到另一个领域。例如,在竞技体育领域,在许多韩国人和韩国媒体看来,体育上的胜

① [韩]《慰安妇协议“做得好”43.2%vs“做得不好”50.7%》,联合新闻2015年12月31日[연합뉴스(2015. 12. 31). 위안부 합의 '잘했다' 43.2% vs '잘못했다' 50.7%],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51231058000033>, 2023-07-17; [韩]韩国盖洛普:《舆论日报第193号(2016年1月第一周:大选支持率、慰安妇问题协议)》,2016年1月7日[한국갤럽(2016. 1. 7), 데일리 오피니언 제193호(2016년 1월 1주)- 총선 지지정당, 위안부 문제 합의], <https://www.gallup.co.kr/gallupdb/reportContent.asp?seqNo=720>, 2023-05-17。

② 木宮正史『日韓關係史』,183—185頁。

利起到了补上独立运动中“失去的民族运动最高峰”、为韩国人带来精神性补偿的角色。^①

在本质民族主义强势的情况下，两国都有着往回看的倾向。日本需要用过去来建立现在的自信，韩国习惯用过去的屈辱来寻找当下的意义。这是一种“回望过去的爱国心”。^② 由于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来自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因此，它们往往混在一起，成为两国相互攻击和伤害的媒介。事件与风波或许会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解决，但是，它们会继续沉淀，成为下一次争论时可供调用的资源。

(四) 近代化民族主义与对历史认识问题的认知

在“相互攻讦”和“问题混一”的新摩擦模式下，可以看到韩国政府和日本保守政治家已经失去了对本质民族主义的压制作用，民众态度对历史认识问题产生重要影响，似乎本质民族主义对历史认识问题有着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近代化话语在历史认识问题中依旧有体现。

2013年起由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和韩国东亚研究院共同进行的日韩共同舆论调查询问了两国受访者“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必须做什么？”这个问题。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较为类似。韩国受访者选择最多的三项是“解决历史认识问题（慰安妇、强征劳工）”“解决独岛问题”“解决和历史认识与教育有关的问题”，而选择这三项的日本受访者则比韩国少，这在最初几次调查中尤为明显。但是，选择民间交流、建立信赖关系等选项的日本受访者则比韩国受访者更多。^③ 同样，日本广播协会（NHK）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在同样问题上，选择“解决贸易不平衡”“解决独岛问题”“解决战后赔偿问题”和“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等选项的韩国受访者更多，而选择“政治交流”“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日本受访者更多。^④

相比于日本，韩国受访者认为解决具体的历史认识问题更为重要，而不是政治对话、交流、信赖关系等更宽泛方式。在近代化竞赛中，日本的领先地位使得历史认识问题并不如此迫切；相反，在日本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守

① 木村幹「近代韓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223 頁；吳炫錫「韓国におけるサッカー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変容」、『スポーツ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1 号、29—41 頁。

② 车维德将这种执着于过去遗憾历史的爱国心称作“回望过去的爱国心”，参见ビクター・チャ「日韓の歴史に根ざした情念」、船橋洋一編著『日本の戦争責任をどう考えるか』朝日新聞社、2001 年、54 頁。

③ 参见第 1—10 回『日韓世論調査比較分析結果』、言論 NPO・東アジア研究院、2013—2022 年、<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category/cat346.html>、2023-05-17。

④ NHK 世論調査部河野啓・原美和子「日韓をめぐる現在・過去・未来：日韓市民意識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2010 年 11 月号、29 頁。

护”自己的过去更为重要。而对于追赶的韩国民族主义而言,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意味着对过去殖民历史的清算,是真正近代化路上必须经历的过程。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清算殖民遗产(去殖民地化)成为了韩国近代化历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

只不过,这种近代化民族主义的目标已经受到了本质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这时的近代化目标已经不仅面向未来,而且看向过去。也就是说,近代化民族主义需要以一种本质民族主义所期望的纯粹的面目走向未来。

为了这种本质民族主义的要求,需要对历史进行辩护。然而,日本希望守护的历史正是韩国希望打破的,守护这段历史和打破这段历史同时又是各自本质民族主义和近代化民族主义共同的必然要求。本质民族主义要求保护本民族的神话,而这段殖民统治历史又是日本近代化的重要一环(至少日本如此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近代化视角下,几乎不可避免地以西方国家为参照。在日本政府看来,其对朝鲜半岛的殖民活动不过是当时世界强国的通行做法,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西方国家也常常站在反殖民的对立面。尤其是在英法等国重返殖民地的大背景下,“旧金山会议”确立的政府间和解体制本身就刻意淡化殖民与去殖民的属性,因而韩国的去殖民诉求对于战后日本而言也就并非核心问题。^①相反,打破这段历史又是韩国实现真正近代化路上必须经历的一关,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韩国的身份认同。在这一背景下,道歉、赔偿也很难改变韩国人的对加害者日本的认识。^②对韩国来说,解决这些殖民遗迹才是建设近代国家的必然诉求。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近代化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地位的状况下,日韩历史认识问题的主基调是“务实处理”,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转变为“激烈摩擦”的状态。

结 语

本文以本质民族主义和近代化民族主义为框架分析了日韩历史认识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虽然民族主义因素并非日韩历史认识问题走向困境的唯一原因,但是,民族主义因素渗透在历史认识问题的各个环节,几乎所有论述都无

① 波多野澄雄「『政府間和解』の陥穽——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体制における「植民地主義」の位相」、波多野澄雄編『国家間和解の揺らぎと深化——講和体制から深い理解へ』明石書店、2022年、19—47頁。

② Roman David, “The Past or the Politics of the Present? Dealing wit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 Korea,”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22, No.1, 2016, pp. 57-76.

法绕开它。冷战终结的国际格局变化、民主化的国内进程、韩国女性运动的发展等因素释放了历史认识争议的空间。但是,不同国家民族主义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出现不同历史认识的潜在后果;更重要的是,将这些争议固定在日韩两国关系议程中的是民族主义因素。具体来说,在本质民族主义上升并与近代化民族主义合流的情况下,日韩历史认识问题进入了模式化、常态化的阶段,其解决也愈发困难。

困境首先来自本质民族主义情感的矛盾。本质民族主义将尊严和价值置于民族本身,这本身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至少它在民族间的层面将被隐藏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但是本质民族主义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总是正面的。它过分执着于争议本身,将分歧本质化为民族间的差异;而且它仅仅从民族主体的角度看问题,将“慰安妇”、征用工的“身体”提升为民族“身体”的一部分,反而导致了个体受害者意愿的边缘化和标签化。^①另一重困境则是本质民族主义和近代化民族主义的合流。民族主义这两个侧面的合流使得近代化竞赛的竞争意味更浓。在本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本面向未来的近代化竞赛开辟了针对过去历史的新的赛道。针对过去历史的攻防反而成为了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

克服这双重困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重新认识东亚各民族国家自身。本质民族主义从自身的历史出发确认自身的存在,从而容易将矛盾和分歧本质化。另一方面,近代化民族主义占据主导的历史时期并非对于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重新认识自身,意味着要从更为普遍的人类价值的角度出发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因而,不应像本质民族主义那样将价值全部寄托于自身之中,也不应像近代化民族主义那样将价值置于西方标准的近代化之中。重新审视自身和历史,才是打开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之道。

^① Leo T. S. Ching, *Anti-Japan: The Politics of Sentiment in Postcolonial East As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58.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023

Vol.44 No.3

ARTICLES

Dilemma and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U Migration and Asylum Polic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functionalist Theories

Zheng Chunrong and Ye Siyu (9)

The European Union's common migration and asylum policy is one of the key policy domain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2015 refugee crisis revealed many shortcomings of EU's migration and asylum policy, which has since been consistently plagued by difficulties in seeking reform. Post-functional theories suggest that the limited compatibility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domina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U countries' dealing with migrants from non-EU states are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EU has been struggling to develop a common migration and asylum policy that is fair and cohes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stable and flexibl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EU members have actively accepted and resettled large numbers of Ukrainian refugees, demonstrating the inclusive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to the Ukrainians. To improve policy coherence, the European Union may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igrants from EU states and those from non-EU states. It is likely that EU's common migration and asylum policy will increasingly focus on external solutions in the future.

Nationalism, Race for Modernization, and the History Problem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Wang Guangtao and Yu Jiaru (31)

The history problem is one of the cruxes that influence Japan-Korea relations.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contains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intrinsic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intrinsic nationalism has manifested itself through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the race for modernization, the goal of

which i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as defined by the West. Before the 1990s,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 prevailed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both sides adopted a pragmatic approach toward the history problem. Since the 1990s, intrinsic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 converged, and the history problem was brought to the forefront, showing a new pattern of mutual denunciation and issue mixing. The rise of intrinsic nationalism and its convergence with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 are the two barriers for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solve the history problem.

Pluralism, Solidar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Rights Discourse by the English School

Ma Guolin (56)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luralism and solidarism, the English School provides a relatively complet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system. Although Bull advocated pluralism when he first elaborated on this pair of categories, disagreements existed within the school. The solidarist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necessity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e pluralists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sufficient consensus on intervening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the balancers opposed the choice between respect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protecting basic human rights. Buzan distinguished between state-centric solidarism and cosmopolitan solidarism and tried to use the former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sovereignty. The English School'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has achieved a double transformation: one from legal consensus to equal emphasis on legal and moral consensus, and the other from binary opposition to mutual proximity and partial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School'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t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world society as the cent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order and justice as the primary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combining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research. Studying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English School's human rights discourse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 as it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human rights discourse that bears bo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